



《征韓論之圖》，楊洲周延所繪。左上岩倉與有栖川宮之間應是明治天皇。神奈川縣立博物館藏

◀ (上接 8 版)

力，而他的死则意味着吞并之路的最大障碍被扫除了。

伊藤死后，一进会（此刻由李容九领导）加快了践行合邦主张的步伐。1909年12月5日，日本媒体报道说，一进会于前日发表了《合邦声明书》。一进会向统监府和总理大臣李完用提交了建言书，要求他们将建言书转交给日本天皇和韩国皇帝（同上，第276页）。此举并非仅仅是跟风的机会主义；李容九确信韩国已陷入垂死状态，命若悬丝，保全韩国的唯一希望在于与日本合并，日韩合邦将造福韩日民众。他向韩国皇帝的上疏似乎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

一进会长李容九等代表百万会员二千万臣民，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百拜，上言大皇帝陛下……今我大韩国，拟之如病人，命脉已绝久矣。臣等呼号之，徒为抱死尸而恸哭……幸我与日本源自同族，枳橘之迥异未生，今相闻未甚，廓然撤其疆域，划除两邻之藩篱，两民自由于一政教下嬉游，均享同居同治之福利，谁敢辩此为兄、此为弟？即日本天皇陛下之至仁，必给同等之民，化育我二千万同胞……吾蝉脱保护劣等国民之名实，列于新大合众、世界第一等民族之上，则可谓云华始开，景星凤凰相见之时也。[日文原文最初登载于1909年12月8日的《东京朝日新闻》，转引自闵杵渊信雄，《日韩交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6页。根据传说，优昙华（婆罗花）三千年才开一次花，景星（一颗福星）和凤凰都预示着未来的好运。]

12月4日，李容九递交了自己和“一百万民众”署名的建言书，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他们痛斥一进会成员为卖国贼（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p.239-240）。韩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统监曾称荒助告诉日本记者，对于日韩合并，他仍没有任何明确的话语。他强调，一进会发表声明一事，日本政府绝对没有牵涉其中。日本政府认为合邦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只有等到恰当时机，并在做好适当准备后才可以行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进会并没有耐心等待，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杵渊信雄，《日韩交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7页）。

李容九声称的韩日民众基本上属于同一人种、有着相同传统的主张，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屡屡被日本人重提，来证明征服韩国是正当行为（如需了解当时日本人如何论证日本人和韩国人有着“共同文化”和“共同祖先”，请参阅 Peter Duus 的绝妙分析，见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p.413-423）。两国的正式国界线被取消后，一些日本人甚至称韩国人为“半岛人”。这是一个让韩国人觉得极具冒犯性的叫法，因为它否认了韩国的存在，认为其只是一块土地的投射而已。也许李容九所表达的无非是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即从小接受儒家四书教育的韩国绅士和接受了同样教育的日本绅士可以毫不费力地“笔谈”，而且两国宫廷遵从的复杂礼节基本上都是以中国的礼节作为蓝本。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前东学党仇外主义的倡导者竟会安之若素地盘算着让外国人统治韩国，而这个外国人不仅说着不同的语言，还拥有与韩国不同的彻底西化的政府。

对于占领一个和自己一样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日本似乎没有丝毫怀疑这一行为的正当性。现在，韩国的军事力量弱小，在东亚国家的现代化竞赛中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对于

韩国抗拒日本送来的现代文明的大礼，日本政府感到很不解，只能将此视为无知。日本领导人中最不同情韩国的山县有朋称：“朝鲜未有如我国足以吸收新文明之素养及力量，其国民上下姑息，苟且偷安……”[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見書》，第284页。相比之下，伊藤对韩国接受现代文明的可能性表现得更加乐观。他认为，韩国人之所以落后于日本人，并非因为他们天生懒惰，而是因为上层阶级腐败和抗拒变化（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199)]

无疑，吞并韩国是统监府的目标，但其官员决定在日韩合并之前对“义兵”的抵抗进行镇压。1909年9月，日本开始在韩国南部进行镇压反抗的军事行动。这场行动采用残酷的肃清法，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一方法此后被全国各地的类似行动采纳。很多韩国人直至今日仍抱有对日本的仇恨之情，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森山茂德，《日韩併合》，第178页）。

1910年5月，寺内正毅接替患病的曾祚担任统监，同时继续担任陆军大臣。7月，就在寺内乘船驶往韩国前不久，总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向天皇奏报了韩国的情况。听了奏报后，天皇令寺内携带一封私信和各种礼物送交给韩国皇帝（《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30页）。让人惊讶的是，就在日本政府要夺去韩国皇帝的帝位之前，天皇还在遵循着东方社会自古与其他君主礼尚往来的做法。也许他还不清楚合邦将给韩国君主造成多么巨大的影响。

甚至在抵达韩国之前，寺内便为就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是将韩国的警察活动全部纳入日本的指挥之下。在被问及为什么日本宪兵数量大大增加时，据说他是这

样回答的：“比起普通警察，使用宪兵来管制未开化的民众更容易些。”（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74. 崔文衡的资料出自福田东作，《韩国併合記念史》，第597页）

从担任统监起，寺内便耐心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便启动日韩合并机制。8月，这一刻似乎来临了。寺内收到越来越多的关于韩国各界人士同意日韩合并的报告。但是，仍有一个主要的关注事项有待澄清，即民众担心韩国皇室的待遇，以及内阁总理大臣和其他高官政要的将来地位。寺内向韩国内阁成员悄悄传话，解释说日本天皇宽宏大量，日本政府公正合理，他们不会让韩国人——无论是皇室成员还是谦卑的农民——陷入困境。内阁成员即便全体辞职，也不会对日本政府的决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他们的逃避行为，反而会伤害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5—456页）。总理大臣李完用被说动，决定面对危机，而不是逃避。寺内猜测李完用的态度已经改变，于是于8月16日派人去请李完用到统监官邸。

李完用一抵达统监府，寺内便递给他一份与合并条约有关的备忘录。备忘录以我们熟悉的概括性话语作为开篇：日韩两国国土相连，文化相似，自古以来凶吉利害与共，最终形成不可分离的关系。正因如此，日本敢于冒两次大战的风险，牺牲数万生命和数亿财富来保护韩国。自那以后，日本政府虽热心投入精力帮助韩国，但由于现行保护国的制度过于复杂，无法永久、充分地保护韩国皇室的安全与日韩全体人民的福祉。因此，日本认为两国应联合起来，合为一体。

备忘录继续说，毋庸讳言，两国合并不应视为战争或敌视

的结果。相反，这份条约将是双方带着友好的感情签订的。考虑到目前形势，韩国皇帝自愿将统治权让与日本；韩国皇帝将退位让贤，日后将居闲职；为保护韩国皇帝、太上皇、皇太子和其他皇室成员的安宁，以及为确保所有阶层的韩国民众的福祉，日本认为有必要缔结合并条约（同上，第451—452页）。

最终向韩国政府递交的合并条约由八条规定组成，主要是向韩国皇帝和贵族做出了确保他们在合并后得到善待的保证[同上，第461—462页；译文见 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p.136-138。统监寺内向李完用提交的版本只有五条。序言部分只有两条（韩国皇帝愿意将其统治权让与日本；日本天皇愿意接受合并韩国），第八条（条约颁布）被遗漏掉了，但余下条款大体相同。总的来说，日本兑现了这一承诺。韩国皇室成员和其他高层贵族获封日本的爵位，并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按照习以为常的方式继续生活[1910年10月向76名韩国贵族授予了日本的爵位：6名侯爵，3伯爵，22名子爵和45名男爵（《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88页）。同年12月，前韩国皇帝被封为日本陆军大将；韩国皇太子被封为步兵中尉；放荡不羁的哥哥李垞和其他贵族被封为中将。也许皇太子是这些军官中唯一一个真正履行军事职责的人。至于其他人，均根据级别获得了良好待遇并配置了武官（第535页）。退位后，纯宗和太上皇高宗继续住在汉城的德寿宫。1920年，在日本接受优质教育的韩国皇太子李垞与梨本宫亲王的长女方子结婚。在他担任日本军官的卓越的职业生涯中，李垞最终晋升到第一航空军司令。

寺内给李完用看的备忘录

(下转 10 版) ▶